

on n'avait entendu une voix aussi basse, menée avec moins de méthode. Son directeur la jugea bien, elle chantait comme un seringue. Et elle ne savait même pas se tenir en scène, elle jetait les mains en avant dans un balancement de tout son corps, qu'on trouvait peu convenable et disgracieux. Des oh! oh! s'élevaient déjà du parterre et des petites places, on sifflotait, lorsqu'une voix de jeune homme en train de muer, aux fautes d'orchestre, lança la conviction :

— Tais-toi!

Tout la salle regarda. C'était le chérubin, l'échappé de collège, ses beaux yeux écarquillés, sa face blonde enflammée à la vue de Nana. Quand il vit le monde se tourner vers lui, il devint très rouge d'avoir ainsi parlé haut, sans le vouloir. Daguès, son voisin, l'examinait avec curiosité, le public riait, comme désarmé et ne songeant plus à crier; tandis que les jeunes messieurs en gants blancs, sautoignés eux aussi par le galbe de Nana, se penchaient et applaudissaient.

— Quel ça, très bien! bravo!

Ensuite, cependant, en voyant rire la salle, se sentant mise à rire, la gaieté redoubla. Elle était drôle tout d'un coup, cette belle fille. Son rire lui creusait un amour de petit trou dans le menton. Elle attendait, sans gêne, familière, entrant tout de suite de plain-pied avec le public, ayant l'air de dire elle-même d'un clignement d'yeux qu'elle n'avait pas de talent pour deux liards, mais que ça ne faisait rien, qu'elle avait autre chose. Et, après avoir adressé au chef d'orchestre un geste qui signifiait : « Allons-y, mon bonhomme! » elle commença le second couplet :

A minuit, c'est Vénus qui passe...

C'était toujours la même voix vinaigrée, mais à présent elle grattait si bien le public au bon endroit, qu'elle lui tirait par moments un léger frisson. Elle avait gardé son rire, qui éclairait sa petite bouche rose et luisait dans ses grands yeux bleus très clairs. Elle se penchait certains vers un peu vifs, une friandise retroussait son nez dont les ailes roses battaient, pendant qu'une flamme passait sur ses joues. Elle continuait à se balancer, sachant faire que ça. Et on ne trouvait plus ça vilain du tout, au contraire; les hommes braquaient leurs jumelles. Comme elle terminait le couplet, la voix lui manqua complètement, elle comprit qu'elle n'irait jamais au bout. Alors, sans s'in-

娜 娜

[法] 左拉 著

I565.44

1396

娜 娜

[法] 左 拉 著

郑永慧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八 年 北 京

前 言

左拉于一八四〇年四月二日生于巴黎。父亲弗朗索瓦·左拉是法国籍的意大利威尼斯人，工程师；母亲埃米莉·奥贝尔是法国博斯人，手工艺人的女儿。一八四三年左拉全家居住在埃克斯，父亲弗朗索瓦要在这里建造一道水坝和开凿一条运河，他们的生活很安定。到了左拉七岁时，父亲突然逝世，从此家庭陷入贫困，母亲于一八五七年迁回巴黎，左拉要靠助学金才能继续在中学读书。一八五九年在巴黎参加中学毕业理科会考，两次都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愿望，在家闲居两年。家中经济越来越困难，一八六〇年四月左拉不得不接受一个职位，在海关码头当小职员，整天伏案抄抄写写，每天工作十小时，每月工资六十法郎。左拉对这个工作厌烦已极，宁可贫困，也不愿意继续干下去，过了两个月，他就辞去了职务。在失业期间，左拉读了很多书，他自己也尝试写过一些诗和一篇短篇小说。他的中学时代的朋友，后来的印象派大师塞尚，当时也在巴黎，他们就经常联袂去参观画展和画室。左拉在失意时意气并不消沉，相反，他雄心勃勃，对将来抱着极大的希望。他于一八六〇年写信给好友巴耶说：“关于前途问题，我一无所知。如果我决定走文学家的道路，我愿意按照我的格言去做：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我不想踏着前人的足迹前进，这倒不是我有野心想当一个学派的领袖……可是我想找出一条前人未走过的道路，从我们时代的平庸作家群中脱颖而出。”他的豪言壮

语后来果然实现，左拉成为自然主义的奠基人和主将。

一八六二年三月一日，左拉进入阿歇特出版社工作，起初在发行部当打包工，后来由于聪明能干，被调到广告部，很快就升为主任。在任职期间，左拉结识了许多作家和新闻记者。出版社老板路易·阿歇特劝他放弃写诗，他写了几部短篇小说，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后来于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合成一集，名为《给妮侬的故事》，这就是左拉的第一部著作。这本书的出版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三个出版社都拒绝了这本书，左拉毫不灰心，把稿子拿到拉克卢瓦出版社，开口就对老板说：“这部稿子已经有三个出版社拒绝接受。”拉克卢瓦惊异地望着左拉，心想这种事通常投稿人是隐瞒的，这个人为什么要说出来？左拉接着说：“可是我有天才。”左拉天性坦率，他认为他有天才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不必隐瞒，说出来也不必脸红。拉克卢瓦终于接受了这部稿子。左拉于一八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辞去阿歇特出版社的职务，成为职业作家，为许多报章杂志撰写文艺评论和小说。一八六七年他的长篇小说《德莱丝·拉甘》出版。他的生活有了改善，搬进了一家像样的公寓。

左拉起初醉心于浪漫主义，受过缪塞很大的影响；后来又爱上了现实主义，热烈地崇拜巴尔扎克。他很想学巴尔扎克的样子，写一部自己的《人间喜剧》，但不知从何着手，他又不愿草率从事，怕人家说他抄袭。这时候，前来给他启示的，是科学。十九世纪中叶，科学技术有了蓬勃的发展，人类生活条件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科学似乎是万能的，能解决一切问题，任何奇迹都能出现。左拉读过达尔文的《进化论》，读过泰纳的《艺术哲学》，也读过吕卡的《遗传论》，最后给他启示的，是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在这本书的影响下，左拉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正确的写作方法：只要在小说创作中采用严格的科学分

析,小说家就能与科学家一样的工作。他天真地想:到目前为止,作家只依靠他们称为灵感的东西来写作,得不出科学的结果。这种混乱状态必须结束。从今以后小说不再是供人玩赏的东西,科学家在实验室,小说家在书斋,追求的都是同一目标:认识真实。贝尔纳在人身上所做的实验,左拉将施之于人的情欲和社会环境;他将指出人不是孤立的个体,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许多现象汇集的结果,只要研究这些现象,就能理解人而且正确地描写人。左拉认为实验小说的时代终于来了,只要实验小说家指出社会的弊病,政治家就能确定医治这种弊病的药方。左拉就是抱着这种信仰去创立自然主义,又把这种理论应用到写作《卢贡-马卡尔家族》中去的。我们不要以为左拉的想法幼稚,到今天不是还有许多作家把医学上的新发现,应用到小说创作中吗?例如精神分析法和意识流,这些文学创作手法就同医学理论有关系。

一八六八:left拉开始构思与《人间喜剧》齐名的辉煌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这部巨著包括二十部长篇小说,以第二帝国为背景,每一部小说都以卢贡-马卡尔家族的一个成员为主人公,情节各自独立,反映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左拉将写作计划交给出版商以后,出版商每月支付五百法郎给左拉,连续支付了好几年,使左拉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可以专心写作。左拉自称当时他以“气吞山河”的雄心夜以继日地写作,他在壁炉架上刻了一行金字:“一天至少一行”,他的确是这样做的,在二十五年中,他每天辛勤地写作,一直到一八九三年写完最后一行,才松了一口气。

《卢贡-马卡尔家族》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以后,广大读者还是只知道有雨果和巴尔扎克,不知道有左拉其人。这两个文学巨人挡住了读者的视线,使读者看不到左拉。到一八七七年

出版的第七部小说《小酒店》成了畅销书后，左拉才一举成名，并使独霸法国文坛近一个世纪的雨果退居第二位。

左拉读过傅利叶、普鲁东和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平日生活朴素、严肃，从来不寻花问柳，说话老实，对朋友忠诚，同他来往密切的有福楼拜、龚古尔兄弟、都德、莫泊桑等人。左拉热爱人民，拥护真理，维护正义。一八九四年，法国陆军部发现有法国军官把军事秘密文件卖给德国驻法武官，反动军官和沙文主义者诬告陆军上尉德莱福斯（犹太人）犯有叛国罪，借此掀起反犹运动，这个案件使整个法国分裂成拥护和反对两个阵营。其时左拉正在意大利，对事件经过不清楚。一八九七年他回到巴黎，仔细阅读了有关文件，确信德莱福斯无罪，立即勇气百倍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为德莱福斯辩护。一八九八年一月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给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结果以诽谤罪被判一年徒刑和三千法郎罚金，左拉不得不于同年七月仓皇出亡英国，一直到一八九九年六月对德莱福斯撤销原判，重新审讯后，才回到法国。

一九〇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左拉全家回到巴黎的住所，那天天气又潮又冷，屋里生了旺火。半夜，左拉夫人觉得不舒服，醒来看见左拉倒在地上，跟着，自己也昏倒在地。第二天早上九点钟仆人打开房门，发觉左拉已死于煤气中毒。十月五日举行左拉葬礼，盛况同雨果葬礼不相上下。法国名作家法朗士致悼词，他说：

左拉是善良的。他像一切伟大人物一样，天真而纯朴。他有很高尚的道德。他用粗犷而正直的手来描绘道德败坏的事。他的表面上的悲观和散布在他书页上的忧郁，掩盖不住他的真正乐观，他对智慧，正义和进步的坚定信心。他的小说是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他在小

说中对这个游手好闲和百无聊赖的社会怀着强烈的仇恨，他攻击“金钱万能”这种时代病。他是民主主义者，他从来不欺骗人民，他尽力向人民指出：无知会被人奴役，酗酒十分危险，它能使人民愚昧地、毫无抵抗地陷入一切形式的压迫、贫困和耻辱中。不管在什么地方，他见到社会罪恶，他就在那里战斗。这就是他的仇恨……

左拉的自然主义，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特点：第一，左拉认为作家就像解剖室里的医生，对客观存在的事物，要作科学的分析，并且如实地加以描写；他要求作家大规模地搜集资料，尊重客观现实，敢于把血淋淋的现实投到读者眼前；他把作家从故事的叙述者，变成事实的科学调查者，把纯粹虚构的文学变成探索研究的文学。第二，左拉认为作家应该利用实验医学、生理学以及遗传学、环境学等先进科学知识，去解剖人和观察人。左拉说：“我们的主角再也不是十八世纪的纯粹精灵或抽象个人了，他是我们目前科学的生理学主体，由器官构成的生命，而且不断地受到环境的影响……所有感官都对心灵起着作用。心灵的每一个活动，都为视觉、听觉、味觉、触角所左右而加速或放慢……孤立的心灵在虚无中独自运行的概念，已经成为虚构的了……”左拉认为小说家也是实验家，他的实验是：“在某一故事中安排若干人物的活动，从而显示出若干连续事实之所以如此是符合决定论在检验现象所要求的那些条件的。”第三，左拉在写作上创造了崭新的艺术风格：为了如实地描绘现实，在描写下层人民时，就使用下层人民的语言，哪怕是最粗鲁的语言；在作心理描写时，充分利用有关心理分析的一切细节。左拉尤其擅长描写群众场面，能把壮丽的或者混乱的群众集会交代得层次分明，栩栩如生。

巴尔扎克在世时，法国除了里昂的缫丝工人和手工业工人，

没有产业工人；十九世纪下半叶，巴尔扎克死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资本主义经济继续扩大，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和新兴的化学工业、电气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产业工人出现了，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群众对第二帝国的现状普遍不满，左拉的自然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因此左拉一开始就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第二帝国时代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和腐化堕落，刻画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痛苦；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洋溢着反对资本主义罪恶的精神，每出版一部，必然引起当时一批“正人君子”的痛恨和责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左拉的自然主义继承了巴尔扎克批判现实主义的未竟之业，暴露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激起人民群众对现状的不满，这是自然主义的一大功绩。自然主义还重视科学，矢忠于唯物主义，具有强烈的民主倾向，具有进步意义。左拉强调生理条件、环境和时势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这一点对后世的文学，尤其对当代的小说，具有莫大的影响。

然而左拉的自然主义过分强调人的动物本能、人的兽性，他把人只作为孤立的人，生理的人看待，忽视社会关系对人的制约，因此就不能反映阶级烙印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左拉在回答人家对《小酒店》的批评时说：“我说出我看见过的东西，我把它记录下来，如此而已，我让道德家从中得出教训。我把上层的疮疤揭露，我当然不会隐藏下层的疮疤。我的作品不是党派和宣传的作品，它是表现真实的作品。”客观地有闻必录，见什么写什么，当然就不能够透过现象进行本质的探索，从众多的客观实际中，提炼出典型的环境和人物来，这正是自然主义的致命伤。

《娜娜》是《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第九部。左拉在一八七八年夏天开始构思《娜娜》。这一年，他刚出版了《卢贡-马卡尔

家族》的第八部《爱情的一页》，销路很不好，他写信给出版商夏庞蒂埃说：“《爱情的一页》不可能有像《小酒店》那样的好销路……能卖出一万册我们就该满意了。可是我们要从《娜娜》捞回来，我的想象中《娜娜》是了不起的作品。”可是左拉当时已三十九岁，身体有点发福，他既不寻花问柳，也没有任何艳遇，对烟花巷很不熟悉，怎样写这部小说呢？

左拉在《实验小说》中说：“一个自然主义的作家想写一本关于剧院的小说……他第一要做的是搜集关于他要描写的世界的一切笔记。他认识某个演员，他看过某一出戏，这就是他的资料，最好的资料，在他身内成熟的资料。然后他开始作战，他请那些熟悉情况的人谈话……他去参考书面资料……最后，他到现场观察，在剧院生活几天以熟悉每一个角落，在女演员化装室度过几个夜晚……资料搜集齐备以后，他的小说就自己确定下来了。”

左拉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创作《娜娜》的。他平日经常同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和都德一起聚餐，他自己拙于辞令，大半时间沉默不语，只提些问题，却从这几位作家的谈话中得到大量关于上层社会生活的资料。为了帮助他写《娜娜》，龚古尔兄弟、都德、塞阿尔曾带他去拜访一些交际花；塞阿尔还把自己的笔记本借给他，带他到一个著名的老鸨家里去。还有一个剧作家把左拉带到一个著名女演员的化装室里。

左拉写好《娜娜》的提纲以后，写信向塞阿尔道谢：“十分感谢你的笔记。它们非常好，我全都用上了，晚餐部分尤其惊人。我真希望有一百页这样的笔记。我会写成一本好书的。如果你或你的朋友找到新的资料，再送来给我，我渴望得到一些亲身经历过的东西。《娜娜》的大纲我已写好，我自己非常满意。我花了三天来创造人名，其中有几个我觉得非常成功。我必须告诉

你我已经有了六十多个人物。我还要过半个月才能动笔，因为我还有许多细节要处理。”左拉还写信告诉福楼拜：“我刚写完《娜娜》的提纲，它花了我不少精力，因为这里描写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世界，我要写的人物不少于一百个。我对这个提纲很满意……”左拉关于《娜娜》的提纲现在藏在国立图书馆，其中一条是：“……萨比娜同米法是上层社会的解体，同《小酒店》里下层社会的混乱一样；”另一条是：“娜娜，即安娜·古波，生于一八五二年，是异种的混杂焊接，受父亲精神上的影响较大。”

《娜娜》于一八七九年十月十五日开始在《伏尔泰杂志》上连载，到一八八〇年二月五日载完。读者纷纷猜测，娜娜写的是谁，书中某人又指的是谁，于是龚古尔就预言：“《娜娜》的销路将比《小酒店》更好。”果然，二月十五日《娜娜》单行本发售那天，盛况空前，一天就卖出五万五千册。福楼拜赞美《娜娜》说：“多好的一本书！……那位好左拉是一位天才！”在他写给左拉的一封信里，又称《娜娜》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到今天，《娜娜》始终被列为左拉的杰作之一，与《小酒店》、《萌芽》、《崩溃》齐名。

娜娜本来是《小酒店》中的人物，是洗衣妇绮尔维丝和洋铁匠古波的女儿，名叫安娜，小名娜娜，六岁时就十分调皮，专门作弄教师和同学，喜欢窥探大人的所作所为，十五岁时在卖花店当学徒，被一个富有的钮扣商人看中，后来跟随这个老商人私奔了。到了《娜娜》这部小说中，娜娜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歌剧院女演员，她上演下流的喜剧，诱惑了无数王孙公子，其中有王子、侯爵、伯爵、银行家、贵族子弟、军官、新闻记者等等，他们中每一个人都要和娜娜相好，就不可避免地遭到厄运，有的破产，有的自杀，有的入狱，还有人为了娜娜的缘故，容忍自己的妻子与人通奸，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嫁给娜娜的情夫，自己也落到倾家荡产的地步。娜娜是腐蚀剂，她腐蚀了巴黎的整个上层社会，她的所

作所为是贱民对上层社会的报复。最后，娜娜死于天花，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已经百分之百的腐烂，连腐蚀这个社会的工具本身也腐烂了。

娜娜是作者塑造得很成功的一个形象，她有相当复杂的性格。作为妓女，她用肉体迷惑男人，使他们倾其所有供她挥霍，她习惯于过奢侈淫逸的生活，似乎称得上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女子。然而娜娜对卖笑生涯十分厌恶，她住在华丽的公馆里，但内心空虚、寂寞；她羡慕从良的妓女伊尔玛，梦想将来自己也会有这样一个归宿；她还没有失去一个少女对爱情的天真幻想，憧憬着一夫一妻的小康生活，一直忍受方堂的毒打，结果幻想还是破灭了。她经常叹息：“男人缠得我好苦！”这正是普天下妓女共同的叹息，也是一个被污辱被损害的妇女对卖淫制度的控诉。她虽然处在腐化的环境中，心中仍有不灭的诗情，她到了乡下，望见广阔的天空，翠绿的田野，闻着树丛的香味，走进丰收的菜园，不由得陶醉了，竟冒着大雨去摘草莓。这幕动人的情景，充分表现了娜娜的精神世界。娜娜还是一个慈祥的母亲，真诚地爱着她的小路易，最后竟为照看儿子而死于天花。应该说，娜娜在本质上是善良的。她之所以具有矛盾而复杂的性格，是有其社会根源的。

娜娜的母亲是一个勤劳的工人，企图以自己的诚实劳动换取生存的权利，并为此不断挣扎；父亲原来也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劳动者，在娜娜出生以前并没有什么恶习，后来工伤以后才开始酗酒。所以说娜娜的“四五代祖先都是醉鬼……历代穷困和酗酒的遗传，感染了她的血统”，是没有根据的。娜娜沦为妓女，是因为“家贫万事哀”，父亲喝醉了酒，无缘无故地打她，才使她愤而离家出走，一进入社会，立即在那个金钱统治的社会的逼迫和毒害下堕入悲剧的深渊。她当上了歌剧演员，一举成名，成为名

妓。她在贫困时期所梦想的生活一一实现，但是一旦陷入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她就因沾染恶习而不能自拔，而且永远摆脱不开对金钱的依赖。恩格斯说过，卖淫制度“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就是说，妓女不仅因卖淫而受害，而且被卖淫生活腐蚀灵魂。娜娜的灵魂被腐蚀，纵使她厌恶自己所处的万恶环境，却又无法打破套在她头上的枷锁。她腐蚀男人是不自觉的，就像她啃一个苹果一样。乔治自杀以后，她抱着满肚子的委屈向米法哭诉自己的无辜，这是她对现实生活提出的微弱抗议，但是她又不得不依旧这样生活下去，直到死亡。

左拉在小说的第十章，曾描写娜娜和萨丹在吃饭时故意拿她们的卑贱出身来侮辱同桌的达官贵人；在第十三章又写娜娜要米法伯爵穿着朝服来见她，她在后面用脚踢他，心里想着是踢在皇帝陛下身上，后来她又把庄严的朝服任意践踏，“这就是她的报复！”固然这刻画了娜娜对处境的不满，可是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作者对第二帝国的憎恨。左拉早在第二帝国还很强大的时候就预感到这个腐朽的社会必然崩溃，但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左拉对他所憎恨的社会只能设想：贫苦出身的娜娜，把上层人士一个个腐化，就是对这个社会的报复。左拉所描写的，其实不是一个妓女短暂一生的历史，而是第二帝国达官贵人们的一连串道德败坏史。左拉用娜娜上演的《金发爱神》一剧，对他们的道德作了很好的讽刺，他们就是剧中告状的凡人，他们愿意自己的妻子偷汉，以使自己能够自由取乐，米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人是第二帝国的支柱，他们的荒淫无耻，象征着整个第二帝国的腐朽糜烂。左拉用战争狂热结束全书，暗示第二帝国将在普法战争中覆亡。

《娜娜》出版以后，受到“正人君子”们的大肆攻击，咒骂左拉不道德，把他的书称为“污秽文学”。左拉的回答是：他自己是一

个贞洁的人,从来没有沾染任何恶习,他只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绘生活,他的书中所写过的,他可以从现实生活中举出一百个实例,而且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包括那些咒骂得最凶的人在内。事实上,社会的现实比左拉描写的更丑恶、更肮脏,左拉不过以否定的态度揭露社会的弊病与堕落而已。左拉认为,药方总是伴随着疾病而出现的,他只要写出事实,就可以从中得出道德戒律,所以他的作品是最道德的作品。

今天,《娜娜》被译成各国文字,在公共图书馆中是拥有最多读者的书籍之一,正是历史给予左拉以最公正的评价。

郑永慧



作者 像

第 一 章

已经晚上九点钟了，游艺剧院的大厅里还是空荡荡的。在二楼楼厅和楼下正厅前座里，有几个早到的观众在那里等待，他们在多枝吊灯半明半暗的灯光照耀下，隐没在石榴红丝绒面子的坐椅中。舞台帷幕像一大块红渍，被一片暗影淹没；台上没有一点声音，台前成排脚灯都熄灭了，乐队的乐谱架子七零八落地乱放着。唯有在四楼楼座高处，有持续不断的人声，还不时响起呼唤声和笑声；那里，沿着镀金框架的大圆窗，坐着一排排观众，头上都戴着廉价女帽或者工人帽^①。四楼楼座贴近剧院的圆拱顶，天花板上画着裸体的女人和在天空飞翔的孩子，在煤气灯的照耀下，天空变成了绿色。不时有一个显得很忙碌的女领座员出现，手里拿着票根，指引着走在她前面的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叫他们坐下。他们坐下来了，男的穿着礼服，女的体态瘦弱，挺着胸部，眼睛慢慢地向下张望。

楼下正厅前座里出现了两个年轻人。他们站在那里举目四顾。

“我不是说对了吗，埃克托尔？”年纪比较大的那个大声说，他是一个长着黑色小胡子的大个子青年，“我们来得太早了。你

① 法国剧院，楼下有包厢、前座、后座和舞台两侧的边包厢；二楼是楼厅，也有包厢和边包厢；三楼、四楼是楼座；有时楼厅有两层，两层以上才是楼座。座位越高，票价越便宜，所以四楼楼座票价最低，看客多数是工人、店员或小职员。

应该让我抽完了雪茄。”

一个女领座员刚好走过。

“哟！福什里先生，”她亲热地说，“还有半个钟头才开场呢。”

“那么他们为什么在广告上写九点开演？”埃克托尔嘟哝着，瘦长的脸上显出恼火的样子。“今天早上，在这个剧里担任角色的克莱莉丝还跟我赌咒，说是准八点开演呢。”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用眼睛搜索黑暗中的包厢。可是包厢糊着绿纸，暗得看不清楚。楼下包厢完全沉没在黑暗中。楼厅包厢里，只有一个肥胖的太太，把半个身子靠在栏杆的丝绒上。舞台左右两侧，在高高的柱子之间，有两排边包厢，里面空无一人，包厢外面挂着带流苏的垂饰。金白两色的大厅，由嫩绿色的装饰衬托着，在水晶大吊灯的捻小了的火苗照耀下，隐隐约约的仿佛撒满了微尘一样。

“你给露西买好了边包厢票吗？”埃克托尔问。

“买好了，”另一个青年回答，“费了很大的劲才买到……啊！没有问题，露西，她是绝对不会早到的！”

他忍住呵欠，沉默片刻以后，又说：

“你真走运，你以前从来没有看过首场公演……这出《金发爱神》是今年的一件大事，六个月以来，人们都在议论它。啊！亲爱的，那是美妙的音乐！肉感的演出！……博尔德纳夫很懂得生意经，他把这个剧留到万国博览会期间才公演。”

埃克托尔毕恭毕敬地听着，他提出一个问题。

“还有娜娜呢？那个演爱神的新明星，你认识她吗？”

“喏，又来了！”福什里举着两只胳膊嚷道。“从今天早上起，人家就拿娜娜来烦我。我见过不止二十个人，这个也问娜娜，那个也问娜娜！我怎么知道呢？难道我认识巴黎所有的风流娘儿

们吗？……娜娜是博尔德纳夫的新发现。不用说，一定是个臭不可闻的好东西！”

他平静下来了。可是大厅里空空荡荡，多枝吊灯昏暗无光，像教堂似的肃穆，在肃穆中又充满了唧唧啾啾的说话声和进出关门声，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厌烦。

“不，不行，”他突然说，“在这儿等待，连头发都要等白了。我要走出去……我们在下面也许能够碰上博尔德纳夫，他会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们的。”

下面是高大的进口前厅，大理石地面，检票处就设在这里。观众开始进场了。从敞开的三道栅栏门望出去，可以看见繁华热闹的大马路，在四月晴朗的夜晚，车水马龙，灯火辉煌。车轮的滚动声到了剧院门口，就戛然停止，打开的车门又砰地一声关上，一小群一小群的观众走进剧院，在检票处停下，然后走进前厅深处，登上左右分成两排的楼梯；女人们慢腾腾地在上楼梯时扭动着腰肢。很少的一点拿破仑帝政时代的装饰，把这座前厅打扮得好像是纸糊的列柱廊；巨幅的黄颜色海报贴在光秃秃的灰白墙壁上，在煤气灯的强烈灯光照耀下，显得格外触目，上面用大黑体字写着娜娜的名字。有一些先生走过那里，仿佛被海报紧紧抓住，站在那里观看；另一些先生站在那里闲聊，堵住了剧场入口。离订票处不远，有一个宽大脸盘的胖汉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在那里粗声大气地回答一些人的问题，这些人执拗地要订票子。

“他就是博尔德纳夫，”福什里下楼梯时说。

这时那位经理已经看见了他。

“喂！您办事真讲信用啊！”经理远远地朝他叫嚷。“您答应我写的捧场文章，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今天早上我翻开《费加罗报》一看，一个字也没有。”